

《孟子》批注

上册

北京市建材水磨石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一九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中 华 书 局

《孟子》批注

上 册

北京华夏出版社编印 北京华夏出版社

（北京前门大街北京站前街北京站前街北京站前街北京站前街）

· · · ·

《孟子》批注

上册

北京市建材水磨石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一九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中华书局

1976年·北京

《孟子》批注

下 册

北京市建材水磨石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一九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中 华 书 局

1976年·北京

内部发行

《孟子》批注

(上 下册)

北京市建材水磨石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一九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21¹/₄ 印张 1 插页 340 千字

1976 年 6 月第 1 版 197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18·140 定价: 1.65 元

马克思、恩格斯语录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列 宁 语 录

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凡 例

一、本书中《孟子》原书的文字及篇章分合，一般依照清焦循的《孟子正义》本，个别不当之处，则根据别的本子予以更动。为方便读者查检，每章前面均标出篇、章号数，如2·3即指第二篇第三章。

本书采用简化字排印。

二、在批判地吸取旧注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力求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孟轲的整个反动思想体系对原书文字进行注释。原书中的人名、地名一般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难字、难词一般也只在这一字、词的这一种意义第一次出现时加注，但对那些特别生僻的字、词和容易引起误解的字、词则适当重注。为简明起见，注释的根据和出处，一般不再注明；需要注明的，一般也不称引原文。对历来有多种解释的词句，除个别地方外，一般只注一种说法。难字注音，一般只注今读，但个别地方也根据需要注了旧读。对一些特别难懂的语句，注中作了串释。

三、本书译文，一般采用直译，力求表达出原文的含意和语气。有时因原文简略，直译后语气不连贯或不易看懂，则于原文字义外加上一些补充词句，所加词句用方括号〔 〕标出。

四、本书对《孟子》原书，分别轻重主次，联系现实的阶级

斗争，逐章进行批判。对原书中意思相同或相近的章节，批判时为避免重复，采用“合批”或“互见”的办法。原书中一些次要的、未能在〔批判〕一栏里进行批判的反动观点，则在注释中作一些简要的批判。

五、附录一《重要词语索引》，选了《孟子》一书中反映孟轲反动思想的若干重要词语作为条目，依各条目第一个字的笔画多少排列。为省篇幅，各条目下，不收录出现该条目字样的全部文句，而只有选择地收录其中一部分表现孟轲思想的重要文句。有些文句虽未出现该条目字样，但表现了该条目所标示的思想内容，也酌量收录。各条目下所收录的文句，均注明出处（以篇、章号数/本书页次的方式标示）。个别条目，如“民”，因在原书中出现的次数太多，不再收录有关的文句，仅注明出现该条目的篇、章号数。

六、附录二《人名索引》，收录了《孟子》全书中除“孟轲”外所有的人名（包括别名），也依第一个字的笔画多少排列。各人名下，只注出处（标示方式同前），不收录有关的文句。

七、附录三《战国初、中期形势略图》，后附“地名今址索引”，也依笔画为序。

前 言

继承孔丘衣钵的孟轲，被反动阶级尊为“亚圣”，是孔家店的二老板。《孟子》一书是孟轲和他的门徒所撰述、最后由他的门徒编定的，集中保存了孟轲的反动思想，成为儒家的黑“经典”之一。保存在《孟子》一书里的孟轲的一套反动思想体系，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组成了孔孟之道的重要内容。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至今仍在散发着腐朽的臭气，毒害人民。中国历代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孔孟之道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总是把孔孟之道作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林彪，公然把包括《孟子》在内的黑“四书”吹捧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蓝本”，宣扬孟轲的“仁政”“王道”，说明《孟子》这本黑书是他推行反动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之一。因此，批判《孟子》，对于深入批判孔

孟之道，批判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孟轲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春秋晚期，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摇摇欲坠，广大奴隶的起义斗争促进了奴隶制的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起来向奴隶主贵族展开夺权斗争。到了战国初期和中期，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进一步发展。多数国家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的同时或其后，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魏国在魏文侯(公元前四四五——三九六年在位)时，便任用法家李悝实行变法。李悝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说苑·政理》)，提出“尽地力之教”，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又著《法经》六篇，主张用“法”来维护地主阶级的专政。赵国在赵烈侯(公元前四〇八——四〇〇年在位)时，也任用荀欣、徐越等实行变法，任用贤能，节省财政开支(见《史记·赵世家》)。楚国在楚悼王(公元前四〇一——三八一年在位)时，任用法

家吳起实行变法，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秦国在秦孝公(公元前三六一——三三八年在位)时，任用杰出的法家商鞅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和世卿世祿制度，从各方面加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商鞅变法是一场比较深刻比较彻底的社会革命，它为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基础。韩国在韩昭侯(公元前三五八——三三三年在位)时，用法家申不害为相，制订“三符”之法^①，实行法治。在齐国，齐威王(公元前三五六——三二〇年在位)于即位九年后，采取断然措施，实行法治，重赏了“田野辟，民人给”的即墨大夫，严刑处置了“田野不辟，民贫苦”的阿大夫，于是“齐国大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燕国于公元前三一六年发生燕王子哙让国给其相子之的事件。子之“主断”，是近似申不害一派的法家人物^②。燕王子哙在让国后，又把三百石俸祿以上官吏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另行任命，这对旧贵族是一个重大打击。

和大国的变法改革同时，一些小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也起来向奴隶主贵族夺权。如宋国司城子罕在掌握了宋国“杀戮诛罚”的大权后，约于公元前三五五年，进而杀掉宋桓侯，夺取了政权^③。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各国的变法虽然有早有晚，或彻底或不彻底，并不平衡，但新兴地主阶级已在

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统治，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当时即使是落后的国家，如仍然保存着世卿世祿制度的滕国，井田制也已经开始崩溃(参见本书5·3)。但是，由于旧的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没有完全被摧毁，新的封建统治还不巩固，奴隶还没有完全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还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时时刻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广大劳动人民与没落奴隶主以及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斗争极为尖锐，这是当时社会主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同时地主与农民之间也有矛盾，没落奴隶主为了复辟，常常企图利用这一矛盾，这就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

当时没落奴隶主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有种种表现。在魏国，魏文侯用李悝、吴起、西门豹变法的同时，就有卜商、田子方、段干木等一帮儒生，骗取魏文侯的信任，干扰变法；魏武侯(公元前三九五——三七〇年在位)时，奴隶主贵族势力竟然把吴起排挤出魏国。在赵国，赵烈侯在任用荀欣、徐越变法的同时，也有儒生牛畜向赵烈侯兜售“仁义”、“王道”。在楚国，楚悼王一死，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就把吴起肢解。在秦国，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反动的奴隶主贵族车裂。在燕国，子之在位历时仅三年，就有以太子平为首

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发动叛乱，造成燕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史记·燕召公世家》）。在宋国，司城子罕夺权后没有多长时间，宋王偃（公元前三二八——二八六年在位）行“仁义”，又出现复辟。这一切说明，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有反复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每前进一步，都要同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新兴地主阶级一旦不能坚持变革、战胜没落奴隶主的反抗，奴隶制复辟或部分复辟就随时可能发生。

在战国时代的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儒、法两家的尖锐斗争。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都是本阶级最积极的成员。他们之间的斗争，集中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当时儒家的代表是孟轲，他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逆变法革命潮流，大搞复辟倒退，对以商鞅等为代表的法家推行的变法路线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孟轲，邹国人，出身破落贵族家庭。大约生于公元前三八〇年前后，死于公元前三〇〇年前后^④。传说孟轲小时，其母曾“三迁”、“断织”^⑤，极注重对孟轲的管教，要他读书做官，充当奴隶主阶级的奴才。孟轲长大后，“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治儒术之

道”(赵岐《孟子题辞》),成为孔丘的忠实信徒。

孟轲一生的活动,主要是教授门徒和“以儒道游于诸侯”(同上)。他早年在邹鲁一带讲学授徒。此后门徒日多,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6·4),带领一群复辟之徒,往返奔走各国,摇唇鼓舌,大搞反革命复辟活动。

齐威王时,孟轲曾一度到齐国搞复辟活动(参见4·3),但碰了壁。后来游宋。这时滕文公还是太子,曾两次在宋会见孟轲,孟轲对他“道性善,言必称尧舜”(5·1)。后来又游薛,接着归邹。在由薛归邹途中,曾象孔丘当年“厄于陈蔡”那样,“绝粮于邹薛,困殆甚”(《风俗通义·穷通》)。这说明孟轲一伙儒家之徒极不得人心。公元前三二二年,孟轲在滕(参见2·14),曾要滕文公行“仁政”,恢复已开始遭到破坏的井田制(见5·3);又曾在同农家学派的陈相的辩论中,大肆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

魏惠王(公元前三六九——三一九年在位)晚期,实行法家路线有动摇,“兵三折于外”,国家日益削弱,他为了振兴魏国,在公元前三二〇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此时,六十岁左右的孟轲,“不远千里”(见1·1),从滕来到魏国。当魏惠王向他询问使魏国富强的办法时,他借机兜售儒家“仁政”、“仁义”的

黑货(见1·5、1·1)。但魏惠王深感他这一套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因此“不果所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不采纳他的意见。公元前三一八年，魏惠王的儿子魏襄王即位，孟轲认为他“不似人君”(1·6)，于是离开魏国，奔向齐国。

这时齐宣王(公元前三一九——三〇一年在位)即位不久。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孟轲对游说他在齐国复辟奴隶制抱有很大希望。他首先对齐宣王施用反革命“攻心”战术。据《荀子·大略》记载，孟轲“三见宣王，不言事”，他的门徒产生疑问，他回答说：“我先攻其邪心”，妄图从改变齐宣王的思想入手，进而改变齐国的政治路线。他首先向齐宣王宣传自己的一套“性善论”(见1·7)。齐宣王一时没有识破孟轲的面目，让他做了齐国的卿。但没有给具体职务，只是“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⑥。此后不久，孟轲丧母，归葬于鲁。他违背自己一贯鼓吹的“三年之丧”，在其母刚下葬后就急急忙忙奔回齐国，迫不及待地要游说齐宣王，推行自己的复辟主张。他不断向齐宣王宣扬“仁政”、“王道”，鼓吹恢复井田制和世卿世禄制度(见2·5)。这使齐宣王逐渐认清了孟轲的面目，坚持不给他实权来推行这套主张。孟轲因此对齐宣王非常不满，攻击齐宣王“四境之内不治”(2·6)，